

东北亚研究论丛

DONGBEIJAYANJIULUNCONG

主 编 宋慧娟
副主编 姜维东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论丛

第 1 辑

主 编 宋慧娟

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辑/宋慧娟主编. — 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 - 7 - 5601 - 3639 - 4

I . 东… II . 宋… III . 东北亚—研究—文集 IV . D73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817 号

书 名: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辑)

主 编:宋慧娟 姜维东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黄凤新

封面设计:徐 扬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总印张:10.875

2007 年 7 月 第 1 版

ISBN 978 - 7 - 5601 - 3639 - 4

字数:250 千字

2007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址:<http://jlup.jlu.edu.cn>

E-mail:jlup@jlu.edu.cn

吉林出版集团

《东北亚研究论丛》编委会

主 编：宋慧娟

副主编：姜维东

编 委：刘 矩 宋慧娟 李晓光 李慧娟

李俊方 尚永琪 张淑贤 高福顺

高 娜 姜维公 姜维东 薛海波

致 读 者

近年来东北亚形势风云际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关注东北亚的政治发展前景，军事实力对比，经济合作领域等等。然而，今天的东北亚是历史上东北亚的继承和发展，不弄清历史上东北亚的诸多问题，就无法解释当代东北亚的诸多现象。

有关东北亚历史的研究，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置身于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备受重视，已然成为学术热点。我国的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为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十余年来，重点从事高句丽问题、东北民族问题、中朝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的研究。2002 年在国家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始建东北历史文献信息中心，2004 年吉林省教育厅以我们研究所为主体成立了高句丽渤海文献研究中心。今天我们在学院的领导鼎力支持下，又创办了《东北亚研究论丛》。

《东北亚研究论丛》主要从学术角度阐释东北亚各国的历史问题和国际关系，研讨相关学术动态和学术思想，推介相关学术人物和学术成就，每年出版一部，其作者主要来自本研究所成员，兼有外聘教授和合作者等，论文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和综合性。《东北亚研究论丛》既是展示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个平台，又是我们对外交流的一个纽带。我们不揣浅薄，把成果呈现给大家，就是希望得到各位同仁和专家的积极指导、热情帮助，使我们的研究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同时也真诚欢迎有志于该方面研究的学者加入到《东北亚研究论丛》的学术研究中来，与我们展开广泛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东北亚研究向纵深发展。

《东北亚研究论丛》的出版，得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谢忱。

《东北亚研究论丛》编委会

2007 年 1 月

目 录

[理论求索与实践]

- 从传统民族观与正史体例来看正史四夷传的部族前史兼论族源族属问题 … 姜维公 (1)
- 论中国古代外交关系——宗藩关系 …… 宋慧娟 (9)
- 东北亚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与思考 …… 刘海洋 (17)

[高句丽、渤海历史新探]

- 高句丽的城市与建筑 …… 尚永琪 (21)
- 高句丽建国初期的政治结构与王权的形成 …… 高福顺 (31)
- 试论高句丽初期的“那部体制” …… 薛海波 (39)
- 高句丽、百济起源新论 …… 姜维公 姜维东 (47)
- 高句丽早期政治制度中的平衡体制 …… 刘 矩 (56)
- “西事中原，南侵罗济”：高句丽后期周边政策研究 …… 李 爽 (65)
- 浅析高句丽的“白叠布” …… 鸿 鹄 (71)
- 从渤日交聘看渤海经济布局 …… 孙 倩 (73)
- “开疆拓土、广开土境”：高句丽前期周边政策研究 …… 王 旭 (79)
- 两汉玄菟郡经略高句丽史事考略 …… 赵红梅 (84)

[中朝关系史论]

- 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与朝鲜诚挚事大立场的回归 …… 宋慧娟 (91)
- 论两次朝俄密约及清政府的应对 …… 吕 萍 (101)

[中日关系史论]

- 从总务厅的设置看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 李慧娟 桑秋杰 (107)
- 日俄战争后的中韩日关系探微 …… 李晓光 (113)
- 浅析日欧文明碰撞之初日本的应战 …… 王小欧 (120)
- 略论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 …… 张淑贤 桑秋杰 (124)

[东北史研究]

- 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 …… 李俊方 (130)

- 黄龙国传说 姜维东 (137)
 农安历史与黄龙府文化 高 娜 (141)

[古籍整理与考辨]

- 唐初伐丽将领刘德敏与王勃所撰行状中的平原公 姜维东 (148)
 《三国史记·新罗赫居世本纪》注解 姜维公 (155)

[书讯与书评]

- 《唐征高句丽史》读后感 季天水 (162)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刍议 季天水 (164)

- (1) 公 维 东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2)
 (9) 耿 慧 宋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17)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高句丽史研究]

- (15)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2)
 (31)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39)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47)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50)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52)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57)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59)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84)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高句丽史研究]

- (91)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2)
 (101)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高句丽史研究]

- (107)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2)
 (113)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150)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154)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4)

[高句丽史研究]

- (130) 著 者 佚 高句丽史研究 季天水 (162)

[理论求索与实践]

从传统民族观与正史体例来看正史四夷传的部族前史兼论族源族属问题

姜维公

摘 要 由于特定环境与文化,我国传统史家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史观,史书修撰过程中形成了注重始末缘由的史传体例。在这种民族史观和史传体例的界定下,正史四夷传在介绍部族前史方面有着固定的传统,其表现的正统观与因袭性都与现代史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因而容易在族源族属研究中造成分歧,并在历史研究中,经常被不全面了解者曲解或被别有用心者所歪曲利用。

关键词 民族观 史传体例 四夷传 华夷观念

我国有悠久的史书修撰制度,也拥有保存大量古代史事的典籍,这些典籍是我国学者研究传统历史的宝库,周边国家从事本国史研究亦不得不仰赖取资于此。众所周知,我国在清代以前,是独尊于东亚的大国,二千年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在同样历史长度的系列史书中自然得到应有的体现,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观。中国正史的四夷传既然是史传体,自然有重视始末的传统,且在儒家学派的民族观主导下,叙述时将一些不同族却有地域关系的古代部族置于叙述对象的前期史中,这是中国史书的传统。然而,现在的周边国家根据这些族的前史来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是违背历史真相的,是用现代观念来揣摩我国的史书记载。在我国史书的“中国”与现在人们理解的“中国”并不是同一概念,同样,史书的“蛮夷”、“外国”也不是现在概念中的“蛮夷”、“外国”。比如说,我国正史中,将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作为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的前史,而现在朝鲜半岛学者刻意抹杀曲解前三者,着重强调后者,将高句丽视为其前身国家。在其引用我国正史承认王氏高丽为高句丽之后的记载作为其论据时,我国学者通常未能从我国传统史家的民族观以及我国正史修撰体例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是就事论事地从承袭角度论证“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无相承关系”、从领土角度论证“王氏高丽非高句丽之旧”、从史料角度论证“将高句丽写入王氏高丽传是肇始于新旧《五代史》”。^① 这些论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站在我国古代史家的角度来考虑,而是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的名词概

^① 参见杨保隆:《论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无前后相承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刘子敏:《走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误区——试析古人在高句丽归属上的错误说法》(《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等。

念去指责前人犯下众多常识性错误。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国传统史家的民族观已经和现代民族观截然不同了?为什么没有意识到用各种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古代史籍是苛求古人呢?显然,这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研究态度。通过这一例事实,可以说,不但国外学者无法理解我国传统史家的民族观与史书修撰体例,国内学者也没有完全把握这两点。因而,在我国史书中,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给现代学者研究古代民族的族源族属带来一些困扰,但如果洞彻我国传统史家的民族观以及中国正史的修撰体例,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笔者认为,首先,作为史传之一,四夷传是为了昭示“王化所及”的,儒家传统的民族观自然决定了四夷传在正史中的地位。其次,正史四夷传作为史传之一体,自必遵循史传的撰写体例,注重始末,因而四夷的前期史是其必要组成部分之一。最后,由于世代邈远,加上中国正史四夷传特有因袭性,官修史书通常都恪守陈规,叙述时难免出现常识性错误。

一、古代传统史家的民族观

中国正史,顾名思义,是记载中国历史的正式文献。在我国,通常只将纪传体史书当作“正史”。笔者注意到,国外学者以及国内一些学者将中国正史当作世界史来看待,这种差异,反映的就是我国传统史家和现代中外学者各有不同的民族观。在我国传统史家看来,中原王朝是唯一的天朝大国,大一统观念有着二千余年的历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法统观念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到生活中的秩序准则。在这个准则下,周边各部族、政权的民众都被视为中原王朝的化外之民,化外之民也仍然是皇帝的子民,这是毫无疑义的。^①这种民族观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自然有其存在的基础,尽管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片面的,而在现代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外夷臣服、贡献很多都是中原王朝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并因此将中国视为一个“喜欢在纸上侵略”的国家。这种观点也同样失于片面。在历史上,像突厥、高句丽这样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何止千万数,但为什么突厥、高句丽等古代民族政权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说白了,无非它们可以与现实政治利益联系起来,可以作为领土主权、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依据。显然,国外学者这种一概抹杀中国史书的记载,将中国史书中的周边部族都当作现代意义的“外国”,这也是别有用心之人的片面之论。

我国古代传统史家的民族观是在特定历史环境,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其特点是重文化而非重种族,并认为可以根据文化的更易改变彼此的华夷地位。在历史上,这种民族观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现在看来,这种民族观也加重了种族界限方面的混乱。

这种观念在我国起源很早,从孔子开始,着意加强了这种观念,并得到了儒家学派的支持和传播。在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而这种民族观也体现在正史四夷传中。孔子是崇夏贬夷的,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②但他也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表明孔子认识华夷的地位是可以互换的。孟子说:

^① 古人坚信这种观念,因为他们看到中原王朝的盛衰与部族的盛衰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中原王朝衰弱不振之时,正是周边部族兴盛壮大之机;而中原王朝重新振作之时,又是周边部族走向没落的契机。这种历史循环反复,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准则的信服。在这其中,逃难的汉民起了关键作用。

^② 《春秋左传集解》卷28下《定公下》十年载孔子语。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① 孟子强调的是“用夏变夷”，并非他真的“未闻变于夷者”。^② 后人更将这种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认为孔子作《春秋》，可以根据合不合礼仪、合不合正义来确定某国或某人是夏还是夷。^③ 罗泌《路史》直接说：“用夏于夷者夷之，夷而进至中国则中国之。”^④ 这种华夷可以根据文化改易地位的观点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割据林立的时候，各割据政权互争正统，皆自诩为中国正统而目对手为夷狄。司马氏渡江后，以中原正朔自居，但王导在新亭宴会上的话，仍表明他们视江南为“域外”。^⑤ 北魏孝文帝入都洛阳，推行全面汉化，以中国自居，目江左政权为岛夷，后世也称之为“以夏变夷”；北魏之后，像辽、金这样与南方对峙的政权也皆持此种心态，至于统一中原的蒙古与满清更有以中国自居的理由了，这在其给周边部族的诏敕中明显地将这种态度表达出来，连汉人也得不承认此点。正史的修撰也往往将此作为正统的依据。像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不但获得宋人的推崇，也得到了辽、金的承认。^⑥ 元人修宋、辽、金史时固然以中国正统自居，明人修元史也承认其地位，并不因其“非我族类”而否认其正统地位：“立经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⑦ 又比如说，某个地区分裂了，尽管这一地区仍是汉族为主，但在朝廷方面看来，无疑是“以夷变夏”，这一地区实际上化为“胡貊之地”了。我们看一下唐朝时“安史之乱”、李师道之叛、吴元济之叛时期的唐人诗文，这样的比拟是很多的。又比如说，对于汉魏以来的“东夷”，历代中原王朝都对其青目有加，从《汉书·地理志》的“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⑧ 到清人所谓“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于内”，^⑨ 都处处体现出来，在给予赏赐、封册等待遇时都是四夷中最好的，这也是农耕社会对农耕社会的一种文化认同。在《册府元龟》中，中原王朝将所有与之有交往的部族都称之为“外臣”，但有的外臣被称为君子，封赏有加；有的外臣则以“禽兽”视之，羁縻而已，这也是民族观着重于文化的表现。

正因为中国史家有注重“文化”的民族史观，所以，他们并不像现代史学家那样去严格地甄别部族，经常将一些居地相近、古今不同的部族混为一谈。这种混乱在正史四夷传比比皆是。比如说，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将军事力量作为部族强大的支撑与保证，一个新起的部族，如有高明的领导人，适宜的崛起条件，很快就能凭借军事力量席卷整个游牧区，成为一代霸主；而军事力量崩溃，其霸主地位也更迅速为新起者代替。在唯力是视的政治环境中，在迁徙无常的自然环境中，众多小部族的命运是风雨飘摇，很难独立，而依附大族，对外交往中又难以显山露水。所以，当一个小部族脱颖而出，中原王朝容易知道它发迹的过程，却很难了解其形成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其族源、族名的记载有时是

① 《论语》卷7《宪问》。

② 《孟子集注》卷5《滕文公章句上》。

③ 《春秋繁露》卷2《竹林》。

④ 罗泌《路史》。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29《国语》条：“孝文用夏变夷之主。”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批评《魏书》说：“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鸟夷……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严师少；述道武结婚藩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也反映出元魏以正朔自居的心态。

⑥ 柴德赓《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收入《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云：“我们当初不明白，为什么女真人也尊信欧史。原来照欧阳修的主张，即使‘夷狄’入于中国，称皇称帝，仕于其朝者仍应为其效死尽忠，这叫做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金章宗提倡欧史，有益无损。”

⑦ 李善长《进元史表》，中华书局本《元史》未附。

⑧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⑨ 《明史》卷320《朝鲜传》。

互相矛盾的。以蒙古族族源为例,蒙古族铁骑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横扫亚欧,入主中原,其发迹历史非常清楚。但是,蒙古族的族源却是一个长期众说纷纭的题目。

同时,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骈骊文在公私场合都得到重视,而这种重视言辞华藻、重视典故堆砌的文体也对部族混淆现象起了很大作用。以唐代为例,以林胡、东胡称契丹,以獯虏、匈奴称突厥,以夷貊称高句丽,以百越称南蛮诸国,这样的事例非常多。^①唐之前,唐之后,东胡、匈奴、夷貊、百越之称都在使用,所指对象却并非一成不变。这种族名的可代性也造成许多困扰,增加了学者们在族源探讨方面的分歧。

二、中国正史四夷传的修撰体例

史传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修撰体例,重视叙述的完整。如果传是以人为对象的,必定先交代传主的先世,然后才叙及传主的生平事迹。中国正史四夷传一般都在诸臣列传之后,是以部族或部族政权为记叙对象的,自然也重视对其前史的交代。由于传统民族观特定的模糊性,加上各部族前史也确实难以如实地反映到朝廷,史家习惯了按“东夷”、“南蛮”、“西羌”、“北狄”的方位套用、共用一些前史资料,因而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形成了因袭性很强的资料传承链。

这种资料传承链难免造成了许多错位。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汉族是不断壮大的,也在不断向外拓展,民族融合固然是大趋势,但是,随着汉族拓展的压力,周边诸部族也因之向外拓展,离原住地越来越远,部族名号虽然得到保持,但其在迁徙过程中,也在不断融合土著部族,形成新的部族。或者新起之部族,袭用了前代某些部族的名号或相近名号,中国正史仍出于儒家观念将前代部族史列入其前史之中。比如说:《后汉书·东夷传序》这样叙述东夷的前史:“《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

^① 以上所举的代称是不全面的,以笔者较为熟悉之高句丽为例,其代称有辽东、辽阳、辽左、辽海、青丘、玄菟、桂娄、三韩、岛夷、东夷、玄夷、九种、九夷、海夷、朝鲜、秽貊、马韩、下辰、辰韩、夷貊、高丽、下高丽、鬼夷、韩貊等,大多数与古代民族称呼有关联,高句丽灭亡后,这些称号绝大多数也成为后来的新罗、王氏高丽主、李朝鲜的代称。

朝鲜，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彤威慑北方，声行海表，于是、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① 我们看到，这个传序中，将秦以前的淮夷列入汉代东夷的前史中，这就形成了明显的错位。因为淮夷的位置是在我国黄河以南，而汉代的东夷则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以东，二者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因为范曄这么一联系，现在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汉代的东夷都是先秦诸夷迁到东北来的。国外一些学者更离谱，根据范曄的传序认为淮夷不属于我国，其逻辑是汉代的东夷不属于中国，而作为东夷的前身，淮夷也不属于中国。（二）由于部族过众，或变化频繁，不得已形成套用模式。如南方诸夷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众多的部族，这些部族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同时在正史四夷传中得到反映，而后来修史，很容易将前代显赫部族的简史作为新兴部族的前史。又如北方诸游牧民族迁徙无常，争战频繁，部族更迭之速，是四方夷狄中最突出的一方，也很容易形成借用或套用前史的弊端。（三）由于人为的主观因素，也造成了不少错位现象。在清季以前，我国雄立东亚，视周边诸国诸族皆为臣属。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来写作，自然免不了出错。在正史四夷传中，叙某族历史时往往前溯上古，后及本朝，某族崛起未久，就以前居此地之族史为其族之前史。又如某族与地域相邻之古族，倘有名号等因素相联系，史家多循正统论承认二者之关系。例如，匈奴泯灭已久，然隋唐暨明清之公文笔记朝议私语中，匈奴二字何尝绝口。加上四夷传中史事承袭之风甚重，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前史所有之记载经常不辨正误而因袭成文。

兹举高句丽灭亡后仍作为朝鲜前史一事为例，详细介绍一下正史四夷传这种体例造成的历史与现实的错位。高句丽是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下形成的一个边疆民族，势力逐渐壮大，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鼎足而三，隋唐时称为海东三国。其最盛时的境土包括我国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在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灭亡，其后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250余年后，朝鲜半岛的新罗分裂，逐渐形成三个割据政权，分别以前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为号，史称“后三国”。最后，国称高句丽的王建统一了朝鲜半岛，史称“王氏高丽”。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除了一个国号相同，境土小部分重叠外，没有其他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唐以后的中国正史从此将高句丽的简史作为王氏高丽的前史。为什么中国正史会认为二者之间有承袭关系呢？我们且看唐以后正史方面的资料记载：

《旧五代史·高丽传》：“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故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余，大城置樺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

① 《后汉书》卷85《东夷传序》。

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国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①

《新五代史·四夷·高丽传》：“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二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②

《宋史·高丽传》：“高丽，本曰高句骊。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扶余之别种，以平壤城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亦屡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征绩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以建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③

《辽史·高丽传》：“高丽自有国以来，传次久近，人民土田，历代各有其志，然高丽与辽相为终始二百余年。”^④

《金史·高丽传》：“高丽国王，王楷。其地，鸭绿江以东，曷懒路以南，东南皆至于海。自辽时，岁时遣使修贡，事具《辽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黑水居古肃慎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⑤

《元史·高丽传》：“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绿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⑥

《新元史·高丽传》：“高丽自后唐明宗长兴元年，王建始代高氏，明宗封建为高丽国王，世次俱见前史。自建传至，三百余年未易姓。”^⑦《明史·朝鲜传》：“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⑧

① 《旧五代史》卷138《外国·高丽传》。

② 《新五代史》卷74《高丽传》。

③ 《宋史》卷487《外国·高丽传》。

④ 《辽史》卷115《外国·高丽传》。

⑤ 《金史》卷135《外国·高丽传》。

⑥ 《元史》卷208《外国·高丽传》。

⑦ 《新元史》卷249《外国·高丽传》。

⑧ 《明史》卷320《外国·朝鲜传》。

《清史稿·朝鲜传》：“有清龙兴长白，抚有蒙古，列为藩封。当时用兵中原，而朝鲜服属有明，近在肘腋，屡抗王师。崇德二年，再入其都，国王面缚纳质，永为臣仆，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①

从这些正史记载来看，《金史》、《清史稿》没有直接交代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前史，直接本朝之始写起；其他正史在述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有意概括海东历史发展的历程作为《高丽传》或《朝鲜传》的冠头语。我们看到，除了高句丽外，有些正史还将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也作为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前史内容。在述列过程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历史认识。^② 中国正史之所以承认高句丽是王氏高丽的前身国家，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史家特有的民族观造成的，王氏高丽的创建者王建在打天下时用了“高句丽”的旗号，在儒家的正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史家承认这种国号传承；原因之二是中国正史的修撰体例造成的，中国史书在叙述某一个地区的断代史时，习惯将以往与这一地区有关联的部族历史都作为其前期史，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有一部分领土相重叠，正是由于这种地域关系，中国史书承认高句丽是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前期史是为了满足介绍这一地区前期史的需要，没有朝鲜半岛学者承认的现代意义上国家与主权的概念。原因之三是唐安史之乱以后至元代之初，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原王朝了解朝鲜半岛的情况已经不容易了，尽管王氏高丽与高句丽没有血缘、领土等方面的直接联系，但二者名号相同，过去史家正统观念极强，故易将二者误认为一。原因之四，唐以后的正史皆由官修，加重了四夷传中的因袭之风。官修正史之弊，唐代刘知几言之已深，修史之臣作为集体中的一员，顾虑太多，应付了事的现象很严重。四夷传因袭之风本盛，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这种风气。从上引诸史的资料来看，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错误，可见历史久远，撰史诸臣对王氏高丽、李氏高丽的前史认识不足，对久远历史认识模糊，而又不能追根到底，最后只能含糊概括了事，^③ 也是导致错误的根源之一。原因之五，受《三国史记》误导而然。王建崛起海东，以“高丽”为号。作为王氏高丽之臣子，《三国史记》的撰者尽管将新罗作为王氏高丽的正统的来述列海东三国史事，仍不能不将高句丽史列入本国史中。《三国史记》在宋代就已传入中国，自然也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当宋朝向其使臣询问其王世系时，也因为这层原因，不能也不敢直答，只能含混应付。在这些原因之中，传统民族观和正史修撰体例是导致错误的主要根源。

三、现实政治与历史研究的磨擦

通过上面的叙论，可知中国正史四夷传的部族前史主要是受传统民族史观的影响，受史传体例约束所致。但国外学者利用我国正史四夷传的前史大做文章，毫无例外的都是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古往今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部族，就像昙花一现，消失无踪，国外研究者固然稀少得如凤毛麟角，国内研究者也是寥寥无几。但像百越、匈奴、突

^① 《清史稿》卷526《属国一·朝鲜传》。

^② 正史如是，赵汝适《诸蕃志》、徐兢《奉使高丽图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罗日琰《咸宾录》、董越《朝鲜赋》更无足论矣。

^③ 据《曾巩集》卷31《请访问高丽世次札子》、《高丽世次》与《宋史·毕仲衍传》的记载，曾巩在担任史馆修撰时，曾向上请示，要求访问高丽使臣，以便弄清从高句丽到高丽的发展过程。宋神宗可其请，命馆伴使毕仲衍向高丽使臣崔思齐等询问。但由于王建是冒用“高句丽”之号，对于高丽臣子来说，这是忌讳之事，所以高丽使臣只是含糊回答了事。

厥、蒙古、高句丽、满族、渤海、吐蕃等古代民族，国外学者皆趋之若鹜，国内学者也纷纷加入，热闹非凡。这些民族的史料绝大部分都保存在中国史籍中，国外研究者也不得不将中国史籍记载作为主要史料来源。由于我国传统史书有其特定的传统与体例，对外国研究者而言，本国阙略的古史，凡中史具备者自然顺承不疑，但当中史记载与其国家现实利益相抵触时，则一概以今律古，批评中国史书修撰者的主观；其甚者，不惜扭曲与篡改中国史书记载，作为其论据之基础。至于中国史书中有利其国家主权与疆域的记载，又每不理睬中国正史之修撰体例，断章取义，攀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某些民族及民族政权为其先族或前身国家，而其自认之先族或前身国家之土境今多为我国领土，则妄相攀连，指责中国历史上之侵占，将之作为现实边界交涉之依据。与我国有边界连接之越南、印度、朝鲜（韩国）、苏联、蒙古或曾制造此种历史风波，或有制造此种历史风波的先期研究，企图以我之矛，破我之盾。平心而论，我国政府将以往的历史问题界定在学术研究范畴，将历史与现实分割开来，这是理智而妥善的举措，但是，周边一些国家却毫不领情，动辄将历史问题政治化，挑起新事端，制造新麻烦。对待国外学者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我国学者应战之术颇不高明，例多就事解释，而未能从我国传统的民族观与我国正史体例角度加以阐释说服，故破一曲解，正一篡改，无足改观全局，是一曲解破，复生一曲解；一篡改正，复有一篡改，缠绵胶结，积非成是，遗患大焉。

论中国古代外交关系——宗藩关系

宋慧娟

摘 要 宗藩关系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它的产生与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宗法制、服事制密切相关。宗藩关系存在三种类型，本文重点研究藩国式。藩国式宗藩关系的本质类似一个以中国皇帝为盟主的松散联盟，其特点是在中国政权大一统时联盟庞大繁荣；中国统一政权衰弱时联盟收缩、分散。宗藩关系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其持久存在的动力是双方的相互需要与协调发展。

关键词 中国 藩属国 宗藩关系

古代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域归属概念支配下，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宗藩模式，中国把各交往国家置于纳贡者的地位，通过纳贡、册封等方式建立宗藩式的外交关系，双方在宗藩模式框架内履行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古代中国建立的这种宗藩关系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特别是在东亚业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宗藩关系内涵丰富，性质复杂，与近代西方殖民者和殖民地国家建立的宗属关系迥然有别。本文试就宗藩关系的基本问题作一粗浅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历史上的藩属概念及宗藩关系类别辨析

在中国古代史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个别地方政权和少数民族的组织，均被称为藩服、藩属或藩国、属国，其藩王以皇帝为宗主，彼此结为宗藩关系。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同样套用宗藩关系的模式，一些与中国往来的域外国家，也往往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成为中国形式上的藩属国，双方在宗藩关系笼罩下展开进一步的交往。可见中国古代宗藩关系的内涵比较复杂，它既可以指代中国帝王与个别地方政权的关系，又可以指代中国帝王与羁縻区内少数民族组织的关系，还可以指代中国与之交往的国家间的关系。宗藩关系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对藩国界定的复杂性。藩服、藩国或藩属、属国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界定层面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由于所处的背景不同，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也有差别。

“藩”在《辞海》中有“篱笆”、“屏障”、“有障蔽的车子”、“封建王朝分封的地面”等意思。^①在先秦，“藩”与“樊”意义相同，《毛诗正义》中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句，其中的“樊，藩也。圃，菜园也。折柳以为藩园，无益于禁矣”。^②由于“篱笆”

① 《辞海·语词分册》（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月602页。

②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附释音毛诗注疏第五〔五之一〕〔十六〕。

有阻挡、护卫作用，又引申为政治领域中的维护之意，如“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藩，屏也。^①该句意思是，天子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垣干，捍卫京畿安全，辅弼天子政务。可见天子册封藩国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拱卫中央政权。“藩服”一词则源于《周礼》中的服事之说，即王畿以外，以五百里为率，分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九服。服，服事天子之意。由此可知，藩服最初指第九服，然则后三服地理位置遥远，天子声教邈邈，故而《周礼·大行人》中，阐明前六服的朝贡期限及供品之后，便笼统地说，“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玄、贾公颜也解释道：“自侯服已下，各举一边为号，皆互而通也，其夷狄三服亦自互而相通，是以《大行人》总谓之藩国，世一见也。”^②这就是说，藩服、藩国意思相通，而“藩属”则是藩国的另一种称谓，因而三者没有什么区别。秦汉以后，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藩国的指代也比较广泛，《辞海》把“藩国”释义为古代分封和臣服的各国统称。^③我国较早探究这一问题的钱实甫先生解释为藩部和属国的合称。^④最近张永江在其所著《清代藩部研究》中也涉猎到“藩国”问题，他认为“藩国”是“与中央王朝保持宗藩关系的异民族部落和属国”。^⑤这些认识都有道理，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对“藩国”还有一种解释，如《汉书》中记有：“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⑥这里所说的“藩国”显然是指汉初受封的皇族和功臣领地。所以“藩国”准确地说，应该解释成与中国中央王朝保持宗藩关系的异民族组织、地区和国家较为妥当。“属国”一词在先秦极为罕见，而在秦汉以后的正史或私人文集中较为常见。秦汉时均设有“典属国”一职，“掌蛮夷降者”。^⑦但汉朝在成帝和平元年六月，“罢典属国官，并大鸿胪官”。^⑧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进一步解释道：“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⑨这就是说“属国”是以“国家”形式存在又整体归降于中原王朝的“蛮夷”。孝武皇帝曾起七郡之师，“北攘匈奴，降十万之众，置五属国。”^⑩此中的“属国”亦即归汉朝统辖的少数民族组织。“属国”一词最晚在辽朝时内涵有所变化，《辽史》中记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其中有吐谷浑、高丽、西夏、波斯、新罗、北女直、南京女直等，但高丽、波斯、新罗等显然是独立国家，根本不受辽国统辖，只是有往来之谊而已。所以这里提到的“属国”，不仅有归属的部族，也有独立的国家，“属国”的内涵渗进以国家形式存在却与中央政权保持朝贡关系的藩属国，简称为属国。明清时期，“属国”的内涵比较确定，主要用来表示朝贡的国家，如在明清史籍中常称“属国朝鲜”、“属国安南”等。

①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附释音毛诗注疏第十七[十七之四][五七]。

②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附释音周礼注疏卷三十三·郑氏注贾公颜疏。

③ 《辞海·语词分册》(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602页。

④ 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1页。

⑤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3页。

⑥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列表第二。

⑦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⑧ 《前汉纪》前汉孝成皇帝纪卷第二十四。

⑨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⑩ 《前汉纪》前汉孝哀皇帝纪卷第二十九。